

高质量发展

要靠科技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近日在“青年企业家创新发展国际峰会2018”上表示,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更要靠体制创新。当前,在体制创新方面,需要重点关注三点:

一是进一步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切实调动科技人员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真正激发科研人员发明创新的创造力。要进一步改革科技成果的评价机制,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真正明确界定职务发明人对科研成果的产权关系。要进一步放开重大科技项目的选择范围,允许民营科研院所、民营企业科研人员申报国家项目,并真正一视同仁。

二是进一步加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力度,使企业真正成为有活力的微观主体。企业是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体。要在千变万化的市场中,保证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

三是加大市场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力度,使市场真正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某种意义上就是把稀缺的资源及时配置到市场需要、消费者欢迎的生产经营活动上去。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价格改革要深化,价格要能反映供需,能体现成本,能及时调整,能引导资源优化;税收体制要改革,税制既要简明,又要体现政府的引导;金融体制要改革,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工具的引导,调节资金的分配,优化货币、信贷和资本的配置;土地制度要改革,使土地资源的分配、配置更加有效合理。此外,还要改革破产清算制度,加大僵尸企业破产清算力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失业救济制度和再就业制度。(益青)

把稳定就业

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研究室主任张丽滨日前撰文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稳就业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要将稳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将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确保完成城镇新增就业、城镇调查失业率、登记失业率等各项就业目标任务,稳住就业基本盘。

一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善宏观调控。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努力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降低企业成本,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稳定金融、外贸、外资、投资,稳定市场预期,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二要统筹施策,多渠道创造就业岗位。要大力发展共享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在做大做强新动能中,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要调整优化教育培训内容、模式,实施数字技能提升专项培训,大力发展“互联网+”家政服务、养老服务,开发更多生活性服务业就业岗位。此外,还要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落实就业兜底保障;防范化解失业风险,维护就业形势稳定。(孙昌岳)

本版编辑 欧阳洵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理论逻辑

□ 王东京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成功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回答了公有制与市场能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推动经济理论创新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逻辑前提是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

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理论界对在公有制基础上能否发展商品经济展开了讨论。当时人们一致的看法是,国有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可以产生商品交换,但国有企业之间不可能形成交换关系。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可当时有人质疑,说马克思明确讲“私有是流通的前提”,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何以产生商品交换呢?

追根溯源,公有制不能产生交换的观念是来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交换有两大前提:一是社会分工;二是财产私有且受法律保护。没有分工,大家生产相同的产品用不着交换;若财产不是私有或不受法律保护,无偿占有别人产品不受惩罚,也不会产生交换。

将分工作为交换的前提,学界没有人反对;人们的分歧在于,财产私有到底是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一些国家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理由是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由此看来,对这个问题很有必要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澄清。让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是怎样论述的,其原意究竟是什么?

不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确实讲过,“私有是流通的前提”;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还说,交换双方“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于是有人据此推定,马克思认为交换的前提是私有制。然而认真研读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我们发现以上推定其实是对马克思的误读,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首先,马克思从未说过交换产生于私有制,相反他认为产生于公有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写道:“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边界上,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的。”在《资本论》中他也表达过相同的观点。

其次,马克思讲作为流通前提的“私有”,也不是指生产资料私有。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而且还说,商品是物,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发生关系,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显然,马克思这里讲的“私有”并非生产资料私有而是产品私有。

事实上,生产资料私有与产品私有也的确不是一回事。以英国的土地为例。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英国法律规定土地归皇家所有,但土地上的房屋(产品)却可归居民私有。正因如此,所以房屋才可作为商品用于交换。这就是说,产品能否交换与生产资

料所有制无关,关键在产品是否私有。

既然商品交换的前提是产品私有,那么在公有制基础上产品怎样才能私有呢?要说清这个问题需引入“产权”概念。在现代经济学里,产权不同于所有权。所有权是财产的法定归属权;产权则包含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与转让权。以银行为例,银行的信贷资金来自储户,信贷资金的所有权归储户;而银行通过支付利息从储户那里取得信贷资金的产权后,资金如何使用、收益如何分享以及呆坏账如何处置,银行皆可独自决定。于是所有权与产权出现了分离。

所有权与产权一旦分离,生产资料公有制则有可以私有,因为产权的最终体现是产品所有权。以农村改革为例,当初将集体土地的产权承包给了农民,于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就是农民的。再比如国企,国企的厂房、设备等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而企业之所以能将产品用于交换,也是因为国家将产权委托给了企业,让企业拥有了产品所有权。

综上所述可见,商品交换的前提不是生产资料私有,而是产品私有;而所有权不同于产权,产品是否私有与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关。我国的改革实践也已证明,只要改革公有制实现形式,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产权分离,并把产权明确界定给企业或农户,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可以发展市场经济。

2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逻辑前提是改革价格形成机制

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中央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当年亚当·斯密有个形象的比喻,说资源配置有两只手: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而且他认为,资源配置应首先用无形的手,只有那些市场覆盖不到的地方才需政府拾遗补缺,用有形的手去调节。

上世纪30年代国际上发生了一场大论战。当第一个计划经济国家苏联建成后,许多学者为计划经济大唱赞歌,可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1920年却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指出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可能通过“计划”实现。米塞斯的观点,得到了哈耶克和罗宾斯等学者的极力推崇。

1937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科斯说:资源配置在企业内部是计划;在企业外部是市场。于是科斯问:如果计划一定比市场有效,可为何未见有哪家企业扩大成一个国家?相反,若市场一定比计划有效,那人类社会为何会有企业存在?由此科斯得出结论:计划与市场各有所长,互不替代,两者的分工决定于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人们已耳熟能详,无需再解释。科斯的意思是,资源配置用“计划”还是用“市场”,就看何者交易费用低。若计划配置比市场配置交易费用低,就用计划配置;否则就

用市场配置。逻辑上,科斯这样讲应该没错;可困难在于,交易费用是事后才知道的结果,事前难以预知计划与市场谁的交易费用低,既然不知,我们又如何在两者间作选择呢?

骤然听似乎是棘手的问题,不过仔细想,我们对交易费用并非全然无知。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但凡市场失灵的领域,计划配置的交易费用就要比市场配置低。以“公共品”为例,由于公共品消费不排他,供求起不了作用。经验表明,此时公共品若由市场配置,交易费用会远比计划配置高。

让我用灯塔的例子作解释:灯塔属于典型的公共品,灯塔若由市场配置会有两个困难,一是难定价。由于灯塔消费不排他;且不论多少人同时享用也不改变建造灯塔的成本,故市场无法给灯塔服务定价。二是由于灯塔消费不排他,过往船只中谁享用或谁没享用灯塔服务无法辨别,这样给灯塔收费造成了困难,若强行收费必引发冲突。

可见,无论是定价还是收费,由市场配置灯塔皆会产生额外的交易费用,这也是为何古今中外灯塔要由政府提供的原因。中央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指在公共品领域政府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反过来,非公共品即一般竞争性资源的配置,就要交给市场。市场配置虽然也有交易费用,但相对政府配置会低得多。

中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三个重点:一是市场决定价格,即让价格由供求决定。二是用价格调节供求。价格调节供求的过程,就是结构调整的过程。三是开放要素市场。要让价格引导资源配置,须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若要要素市场被固化,不能在行业间流动,价格机制将难以发挥作用。

3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逻辑前提是政府要立足于弥补市场失灵

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个根本原因是市场会失灵。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后的一百多年里,人们对自由市场一直推崇备至。然而20世纪初出现了第一个计划经济体,1929年至1933年西方又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这两件事不得不让人们对市场进行反思。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出版,更是彻底动摇了人们的“市场信念”,很少再有人相信“市场万能”的神话。

对市场为何会失灵,经济学家有三点解释:一是信息不充分(或不对称);二是经济活动存在外部性;三是社会需要提供公共品(服务)。在我看来,信息不充分与外部性不是市场失灵的原因,公共品会令市场失灵,但除了公共品,市场失灵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经济学家指出市场可能失灵,是想证明政府不可或缺;或者政府可以弥补市场缺陷。也正因如此,所以我不赞成将信息不充分(或不对称)作为市场失灵的原因。理由简单,因

为信息若不充分政府也会失灵。事实上,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资源由市场配置比由计划配置的代价要小得多。恰恰是由于信息不充分,资源配置才需要通过市场试错。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把市场失灵归咎于信息不充分。

再看经济外部性。许多经济活动会有外部性,如造纸厂排放废水废气给周边造成污染,是经济的负外部性。问题是,存在负外部性市场就一定失灵吗?上世纪60年代前,经济学家大多是这样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是庇古,他对解决负外部性提出的方案是,先由政府向排污企业征税,然后补偿给居民。此主张曾一度成为政府解决负外部性的经典方案。科斯不赞成庇古的方案,他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中分析说,由于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企业只承担私人成本而不承担污染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所以经济活动才出现负外部性。于是科斯指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界定清晰,市场就能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解决负外部性问题。比如,政府限制企业排放权,赋予居民不受污染的权利,通过“排放权指标”交易一样可减少污染,市场不会失灵。

再看公共品(服务)。公共品有两个特征:一是消费不排他,二是公共品消费增加而成本不增加,因而不存在边际成本。由此看来,公共品确实会导致市场失灵。但除了公共品,还有一个原因即市场分配机制也会导致市场失灵。根据当年马克思对资本积累趋势的分析,资本主义市场分配将导致两极分化:一极是资本家阶级的财富积累;一极是无产阶级的贫困积累。而且马克思说,这种两极分化的结果必发展为两个阶级的冲突,最后剥夺者一定会被剥夺。

有人认为,马克思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分配,社会主义的市场分配不会两极分化。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实际。众所周知,市场分配的基本规则是“按要素分配”,只要要素占有或人们的禀赋存在差别,收入分配就一定会出现差距,若差距过大就一定产生社会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分配会出现差距,而在于政府能否主动调节并缩小收入差距。

将市场分配形成的过大收入差距看作市场失灵,理论上不应该错。目前中央正在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这既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也是为了弥补市场分配机制缺陷的重要抓手。有一个事实值得我们思考,以往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收入差距并不大,可为何搞市场经济后收入差距就逐步拉大了?主要原因是与市场分配机制有关。

弥补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一般来讲,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有四项: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公平、提供公共品(服务)及扶贫助弱。若从弥补市场失灵的角度看,我认为政府职能可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公正;二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

为维护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和秩序而战

□ 裴长洪

热点聚焦

7月6日,特朗普政府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战,中国被迫反击,世界瞩目。人们不仅关心究竟谁胜谁负,更关心谁是谁非,美国挑事,曲在哪里,中国以有道伐无道,道在何处。

(一)

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是经过协商一致后取得的,这些多边贸易协议是所有成员都需要承诺履行的义务。目前,世界贸易组织拥有多个货物贸易多边协议,还制定了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用它来解决成员间的贸易争端。正是由于世界贸易组织设立的贸易规则和秩序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因此它成为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凝聚力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到2017年7月,世界贸易组织拥有164个成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了多年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地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国在不断扩大开放过程中努力使自己的经济体制和政策与国际规则接

轨,努力使自己适应世界贸易组织章程和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断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审议,并在每次审议之后听取审议机制提出的具体政策建议。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中国愈来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优秀成员。中国始终把维护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和秩序作为自己行动的准绳,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框架内扩大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历史与现实都表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制度保障,多边贸易体制是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美国指责中国采取不公平贸易,依据是什么?依据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这在全球多边贸易规则中找得到根据吗?全球多边贸易规则的精神是鼓励成员的公平竞争,但保护消费者利益。中美在货物贸易领域的差额,是中美经济结构、产品国际竞争力、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等多种市场因素相互作用和公平竞争的结果,贸易差额不等于不公平竞争。

美国还指责中国愈来愈不开放,这符合事实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扩大开放的步伐。无论在关税和非

关税领域,还是在市场准入、金融交易、服务贸易等领域,中国都是愈来愈开放。

(二)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使自己发展壮大起来,这并非美国当权派的初心,也确实出乎其意料,然而,美国自己也从全球贸易规则的建立中得到了很大好处。2002年至2017年,美国对多个国家的货物贸易出口累计增速都超过了进口增速。

这使美国当权派对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很纠结。他们希望自己书写的贸易规则可以约束别人、放任自己。既然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实现不了这个目标,那就另起炉灶。特朗普利用了美国部分民众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美国自身制度的固有缺陷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公平、受益不平衡的不满心理,利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优先”等旗号上台施政,公然弃全球多边贸易规则于不顾。他挑动的贸易战除了霸道,毫无道理可言:

其一,单方加征关税不符规则。今年以来,美国以“301调查”为名,对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第一轮340亿美元,已于7月6日实施。这种做法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WTO规则禁止擅自提高关税和未经授权

专门针对某一个WTO成员采取措施。美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是有承诺履行协议义务的,而美国无视这些基本规则挑起贸易事端,是对WTO规则的公然违反。其二,301调查是针对违反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规则的问题,不是贸易领域本身的问题。仔细看一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中国产品征税的清单,可以发现,这里绝大多数产品同301调查没有多大关系。况且,如果中国存在301调查的问题,相应的行动是将与此有关的案例上诉到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将依据相关协定对成员上诉案例进行调查,所有这些问题都有清楚而完整的规定。而美国既没有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上诉,也没有相应案例和举证,这明显是一个借口。1998年美国曾对欧盟发起301调查,欧盟则诉诸世界贸易组织并胜诉,美国因此承诺不再离开世贸规则体系实施301调查。如今它无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自己的承诺,仅仅根据其国内法,单方面对其他成员进行调查并征收关税,一错再错。

特朗普政府一年多来实行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以美国有无逆差作为贸易规则的基本标准,将顺差国定位为不公平贸易方,反对自由贸易,排斥多边规则,其赤裸裸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挑战全世界。

(三)

当前,全世界有识之士都对公理和正义遭受侵犯感到深深忧虑。人们担心,如果多边规则陷入停顿和无力状态,任凭单个成员任意升级保护主义,世界贸易和经济将陷入新的混乱,其深远后果将非常严重。

在这个关系到中国自身国家利益和世界经济未来的关键时刻,中国理应挺身而出,坚决回击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经济全球化,维护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和秩序,是中国人民的坚定立场,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中国没有退路,只有坚定地同全世界维护公理和正义的力量站在一起,坚决与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做斗争。虽然美国以其实力和霸权,可以逞凶于一时,但绝不可能持久;中美经贸关系固然对中国重要,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必然有杀伤,但中国经济已愈来愈具有内生增长的动力,开放的中国也将拥有更多的贸易伙伴、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以其特有的韧性和有效方式,持久地回击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直至把它打回到谈判桌上来。历史将证明,特朗普政府终究难以逃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尴尬结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